

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

任东升 刘艳春 张在钊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 石家庄铁道学院外语系)

摘要: 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都是作为宗教文化传入中国的, 历时都有千年之久, 与中国的政权更迭和统治阶级有着价值趋同和价值冲突的波动, 呈集体翻译之盛, 促进翻译高潮的形成, 构成中国翻译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或运动。

全面来看, 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共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首先, 两者在翻译实践上有诸多相似。佛经和《圣经》都是通过沟通西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由西域人士传来。最早的汉译佛经和最早的圣经汉译片断都不具备“译作”的性质, 实乃撰述之作。从语言媒介的更迭上看, 都经历了“口头传译—转折翻译—直接翻译”三个阶段。翻译主体都经历了“外国人主译—中外人士共译—本国人主译”的更替。中国的诗学传统对外来宗教经典翻译的强大制约作用。

其次, 两者在翻译理论的探索上经历了三个相似的发展过程。佛经翻译理论的发展可概括为: “案本—中道—圆融”三个阶段; 圣经汉译理论的发展可概括为“本文文意”—“意义忠实”—“信达雅兼备”三个阶段, 从“源本中心”转向“读者中心”, 从而完成了从“神学性翻译”到“非神学性翻译”的过渡。

第三, 两者在中国文学认知语境下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中国文人独特的读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人对佛经和《圣经》特有的认知传统, 其宗教功能被一再淡化。

最后, 两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贡献。

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差异表现在:

首先, 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没有受“征服文化”理念的驱动, 自始至终以“使节文化”的面目出现。圣经汉译活动则不然。唐代和明清之际的圣经译介属于“使节文化”范围, 然而进入19世纪、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 传教士的圣经汉译活动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扯上千系, 遂有“征服文化”之嫌, 这也与基督教新教征服全球的传教战略有关。20世纪30年代之后, 由于华人译者的主动参与, 圣经汉译才重新纳入平等文化交流的轨道。

第二, 以量而论, 《圣经》与佛经不可同语。译家在佛经翻译事业佛教中的特殊地位。圣经汉译不突出译者的个人地位。这种差别同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文化有一定关系。

第三, 圣经汉译的时代特色佛经已经无法拥有。重译《圣经》一直是中国翻译家的梦想。在当代中国, 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读者群体也多样化, 多种版本的《圣经》发挥不同文化功能, 中英文《圣经》甚至进入大陆的课堂。

最后, 一个民族接受异域文化必然会有一个历史的消化过程。佛经翻译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对中国哲学、文化、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影响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圣经汉译活动虽然历时久远, 《圣经》也被认为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部译作之一, 但是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囿于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任何宗教都不享有独尊地位这

样的接受语境,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还是有限度的。《圣经》和佛经在中国语境下均得到诗意的诠释,说明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人读经传统对宗教文本进行了重塑。两者的差异则反映了佛教来源地“印度文化圈”和《圣经》来源地“欧洲文化圈”之间的巨大差别,折射出佛教文化的“使节文化”色彩和基督教文化的“征服文化”特征。

关键词: 圣经汉译; 佛经翻译; 比较研究; 使节文化; 征服文化

论语境的层次性对翻译的张力关系

司显柱

(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要: 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言语行为框架理论,人们使用语言是一种行为,而作为行为的言语活动,一定是在包含着形式(语言)、情景和功能(意义)三个要素的言语行为框架里运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语境决定(语言)形式,形式反过来也建构了语境;形式表达意义/功能,意义/功能由形式体现。以此观之,直接语境,即上下文,显然属于(语言)形式的范畴,是一种言内语境,对翻译的影响最为直接,并主要落脚在对翻译过程的第一阶段——解构原文——和体现于译文编码时的措辞、行文里。

就情景语境(语域)对语言使用的影响,Eggs(1994: 53)认为:构成语言使用的情景语境的三个要素——语场、语旨、语式——对语言的使用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表现在翻译上,概括地说,译者,作为读者,首先必须对源语语篇的语场、语旨和语式及其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特征了然于心;在此基础上,必须对译语语篇的相应特征,尤其是不同于源语语篇之处要心中有数,如此,才可望进行有效的语际转换。

文化语境——体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形:

- (1) 一种在原语文化环境所熟悉的体裁在译文语言文化里并不存在,或反之,因此不可译性(un-translatibility)往往在所难免;
- (2) 同一体裁的纲要式结构在译入语环境里呈现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互文性);
- (3) 同一体裁的纲要式结构虽然在译文语篇里无需作出改变,但其体现样式却表现出不同于原文的情形。

就语境的层次性而言,还有一个更高层面的语境——意识形态问题。使用语言时我们之所以要遵循一定体裁的结构和与其相应的语言体现样式,在语域的层面行文措辞要因应语场、语旨和语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追根究底,根本上说来还是一种文化里所包括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期待等在内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从翻译的角度看,由于翻译所面对的是不同与原文的文化环境,自然地,在意识形态的多个层面上常常不同,从而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操作产生影响。

由于语境的层次性差异,它们对包括翻译这一形式在内的言语编码的作用程度,即张力